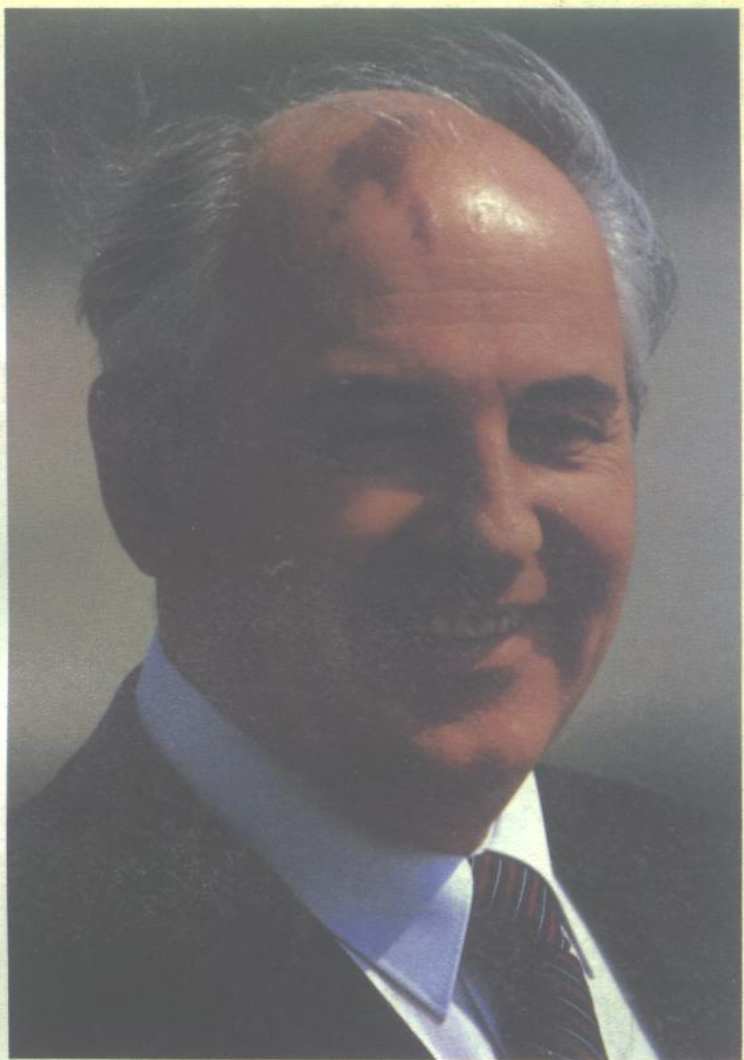


GORBACHEV



戈尔巴乔夫

——克里姆林宫的异教徒

达斯科·多德尔, 路易斯·布兰森 著

8

戈尔巴乔夫

——克里姆林宫的异教徒

达斯科·多德尔、路易斯·布兰森 著

隋丽君 施鲁佳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GORBACHEV

Heretic in the Kremlin

by

DUSKO DODER and LOUISE BRANSON

Penguin Books USA Inc, 1990

根据企鹅出版公司 1990 年版译出

戈尔巴乔夫

——克里姆林宫的异教徒

[美] 达斯科·多德尔 著
路易斯·布兰森

隋丽君 施鲁佳 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三二〇九工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5 印张 插页 2 张 238,000 字

1991 年 7 月第一版 1991 年 7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7-5011-1192-8/D·215 定价 6.20 元 (内部发行)

出版说明

本书是美国1990年夏出版的一部戈尔巴乔夫评传。两位作者悉心研究苏联多年，曾分别担任过《华盛顿邮报》和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驻莫斯科首席记者，并曾多次访问苏联，掌握了大量资料 and 第一手采访材料。此书内容丰富，穿插有不少鲜为人知的内幕故事和小道消息，行文流畅生动，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被美国报界誉为西方评介戈尔巴乔夫的最有见地的一本书。

作者从戈尔巴乔夫的中农家庭出身及其祖、父辈遭遇谈起，介绍了他的青少年时代、大学生活以及在赫鲁晓夫时期开始从政的经历，分析了他怎样在库利科夫、苏斯洛夫、安德罗波夫等人赏识下步步高升，1985年初又怎样在葛罗米柯等人保荐下当选苏共总书记。作者认为，戈氏的早期经历说明了他后来提出“新思维”和“改革”决不是偶然的。

本书的中心内容是剖析戈尔巴乔夫1985至1990年初当权头五年期间的内外政策举措、党内斗争及戈氏思想的发展演变过程。作者认为，戈尔巴乔夫有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决心搞“改革”以阻止苏联国力的衰落。他最初以为基本上保留原有模式也可以实行

改革,但处处碰壁,于是转向“政治改革”,搞“公开性”,逐步排除党内对手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但与此同时,他打开了持不同政见者组织和民族分裂主义等动乱因素的“潘多拉盒子”,使苏维埃国家濒于分崩离析。他鼓吹“民主化”,而又逐步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当上凌驾于党之上的总统。他想要振兴经济,主张向市场经济过度,实际上却是经济每况愈下,不仅受到党内日益强烈的抵制,而且引起工人群众的普遍不满和失望。作者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陷入了困境,而又已无退路。

在外交方面,作者认为戈尔巴乔夫摒弃了勃列日涅夫主义,缓和苏美关系,纠正了入侵阿富汗的错误,实现苏中关系正常化,适应世界多极化趋势,改变了“冷战”格局,为苏联争取到解决国内问题的时间和环境。苏联经济技术的落后、里根的“战略防御计划”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严重事故,迫使他修改苏联战略方针,决心停止核军备竞赛。放弃东欧,则使苏联甩掉了沉重包袱,把东欧的麻烦“转让”给西方。作者赞扬戈尔巴乔夫在外交上的作为,并谈到他多次利用外交上的成就和西方对他的支持,来度过国内、党内斗争中的难关。

作者说,戈尔巴乔夫是在进行一场“大赌博”。他个人和他的“改革”命运如何,尚难以预卜。90年代将是苏联充满动荡和危机的10年,但苏联是否就从此衰落下去,还要再过二三十年才能看清楚。无论怎样,戈尔巴乔夫已开创了俄国历史上的一个新时期,将给时代留下印记。

当然,作者是站在西方资产阶级的立场观察和分析戈尔巴乔夫其人其事,在本书中着意渲染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欣赏戈氏“放弃共产党的权力垄断”、“承认人权”和接受“民主社会主义”。本书以《戈尔巴乔夫——克里姆林宫的异教徒》为名,谈苏联前景的

最后一章则以《一个没有共产主义的世界》为标题，就最鲜明不过地体现出作者的立场及其主观愿望。他们对苏联的观察不可能不带有偏见，他们的议论必然包含着有意无意的歪曲。他们把苏联那些主张全盘西化的人封为“改革派”，而将主张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人统统斥之为“保守派”，则表明他们也象其他大多数西方观察家一样，对苏联的了解仍是有限的，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上甚至是肤浅的。

尽管如此，这本书还是提供了大量的值得一读的情况，有助于我们了解戈尔巴乔夫和活跃在苏联舞台上的另一些人，了解戈氏“改革”的来龙去脉、实质和现状，从中吸取教训，引以为鉴。我们中国人民对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和苏联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十分关注苏联正在发生的事。因此，我们将此书翻译出版，供各级干部和研究工作者参考。

新华出版社

1991年3月

目 录

第一章 一个农村少年所受的教育.....	(1)
第二章 通向权力顶峰之路	(27)
第三章 保守派的最后一次胜利	(47)
第四章 大胆的开端	(63)
第五章 聚积力量	(81)
第六章 外交助内政	(99)
第七章 蜜月的结束.....	(117)
第八章 “公开性”的冒险.....	(126)

第九章	不满的冬天	(140)
第十章	鞭挞斯大林	(155)
第十一章	新思维	(170)
第十二章	整治军方	(184)
第十三章	改革蓝图	(194)
第十四章	保守派发难	(205)
第十五章	面对大谎言	(220)
第十六章	流产的“政变”	(230)
第十七章	想当总统	(253)
第十八章	围攻之下	(264)
第十九章	动乱的帝国	(277)
第二十章	对付重重阻力	(301)
第二十一章	一个没有共产主义的世界	(320)

第一章

一个农村少年 所受的教育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于1931年3月2日出生在普里沃尔诺耶。那是俄罗斯南部绵延起伏的大草原中的一个村庄，他父亲谢尔盖是个恪守先辈传统的农民，想必他曾希望他的三个儿子也能象他一样。但是，到他的第二个儿子米哈伊尔出生时，农村生活的固定程式已经土崩瓦解了。戈尔巴乔夫出生后的头几个月乃至头几年，正好赶上闹饥荒。

1931年，对于戈尔巴乔夫一家以及那个地区的所有的人，都是一个动荡的年头。当时，正值斯大林发起的迫使象戈尔巴乔夫家这样的农民离开私有土地、加入集体农庄的那场运动的中期。但是，农民们却在想尽一切办法进行抵制。有的地区还发生了公开叛乱。抵制、破坏集体农庄的人被运到遍布西伯利亚的“古拉格”，即劳改营。其中就有米哈伊尔的祖父安德烈。这一事实从未公开，但它对少年时代的戈尔巴乔夫却有重大影响。

安德烈·戈尔巴乔夫究竟因为什么被送进劳改营，现在还不清楚，对他提出的指控是他为自己家里的人私藏了大约 40 磅粮食。苏联一位高级官员私下对我们谈及此事时说，普里沃尔诺耶村的一个心怀嫉妒的邻居向当局告发了安德烈，使他被判在人迹罕至的西伯利亚劳改营服刑九年。

戈尔巴乔夫只有很少几次隐约地提到他祖父被逮捕过的事。1953 年，斯大林死后不久，他曾对大学的同学谈起一位在 30 年代受过镇压的近亲，称他是“中农”，即农民中虽然拥有土地、但土地不多无须雇外人帮工的那个阶级。很多年以后，他以总书记身份在一次纪念布尔什维克革命 70 周年的会上讲话时，曾以缠绵悱恻的情绪谈到 30 年代对中农的“不公正”和“过火”的做法。他说，他们是“工人阶级坚定而可靠的同盟军，新的基础上的同盟军”。

后来，到 1986 年秋天，戈尔巴乔夫在审查反斯大林主义影片《悔悟》之后，对前去访问的三位意共人士吐露过这样的秘密：该片有好几个场面他是强忍住泪水看的。他说，片中的一个情节——秘密警察敲一位无辜音乐家的门，要在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把他投入监狱——使他回忆起祖母讲过的关于他祖父被捕的那天晚上的故事。后来，戈尔巴乔夫又对他的助手说：“一定多制些拷贝，使全国每一个人都能看上这部电影。”这是第一部不留情面地揭露斯大林恐怖统治的影片。

米哈伊尔从政后，安德烈·戈尔巴乔夫被捕一事便具有了内在的重要性。这是认识戈尔巴乔夫内心世界的一个少有的线索，它对于我们对他的性格的看法、对他后来的许多行动的解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米哈伊尔一进入从前沙皇的办公室，苏联宣传机器就自动把他的祖辈变成了模范共产党人，以此来美化他的形象。虽然戈尔巴

乔夫并未说假话，但是安德烈·戈尔巴乔夫的经历一直秘而不宣，而只强调他的外祖父潘捷列伊。潘捷列伊只是一个名，姓什么却一直没有透露，只知道他是该地区某集体农庄的第一任主席，虽然这个集体农庄究竟位于何处一直是个谜。他不愿意别人窥探他的私事，这倒不是说他想隐瞒自己的来历，而是由于俄国人向来认为详细打探统治者的私生活是不合适的，因为身为沙皇，他应当是超凡脱俗、君临一切的。

斯大林的镇压运动加上 1931 年秋季的歉收导致了 1932—1933 年的饥荒，这场饥荒最终成了摧毁农民的意志的一个因素。据说，单是斯塔夫罗波尔这一个地区就死了五万多人。

戈尔巴乔夫的幼年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时期——这也正是他祖父被关在古拉格中的时期——度过的。他秘密地接受了洗礼，而且象在布尔什维克大张旗鼓进行反宗教宣传的那些年中常有的情况一样，他的洗礼没有登记。这个仪式本身大概也没有在他思想上留下长久的印记。不过，另一件事情却留下了印记：他的弟弟亚历山大出世了，这个弟弟成了他母亲的心肝宝贝。亚历山大是她最小的孩子，比米哈伊尔小 16 岁，所以她对他较之对家庭中的其他成员更加疼爱。自大哥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死在前线之后，两兄弟间大概有过争斗，因为他们在后来的生活中彼此间看不出有什么友爱之情。亚历山大长大后只是个既无特别的天分又无特别的德行的普通人。给戈尔巴乔夫家的所有成员都治过病的莫斯科著名眼科医生斯拉瓦·费奥多罗夫指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同他弟弟之间的关系是正常的，但多少有些疏远；亚历山大偶尔去看望这位苏联总统，也同任何别的来访者一样是要规定时间的。

然而，米哈伊尔却得到祖父母较多的疼爱。他父亲谢尔盖参加

红军去打仗后，他便由从劳改营放回来的祖父安德烈抚养。他祖母教给他的古老的哥萨克歌曲的歌词，他一直没有忘记。他从她那里继承了对语言和讲故事的爱好，这种爱好把他带进了想象的王国。当上苏联领导人后，他常常借助于俄罗斯民间故事中的形象来阐述某个观点。

他还教会他生存的本领。许多年后，他还记得他祖母悄悄讲给他听的有关他祖父的故事，甚至在当时他就知道这些故事是令她痛苦的。谁能给他祖母带来这么大的痛苦呢？他祖父怎么会是“人民的敌人”呢？

直到很久之后，他才懂得了这些问题的答案的全部含义。

无论是他的祖母还是戈尔巴乔夫家的任何其他成员都不会想到，小米沙（米哈伊尔的爱称）50年后会作为苏联的第七位最高领导人坐在斯大林坐过的那把椅子上。他的崛起本身就象一篇俄罗斯民间故事。

在1932—1933年那场使大约1450万人死于饥饿和贫穷的人为饥荒过去之后，农村开始了缓慢的复苏过程。

集体化的最初好处以新的农业机械的形式出现了。戈尔巴乔夫的父亲谢尔盖当上了拖拉机手和康拜因手。苏联官方的一篇文章介绍他为人“谦虚，由于技艺高、懂经济以及在党的事务方面表现出智慧和待人平等而深受敬重”。这番赞扬表明谢尔盖·戈尔巴乔夫是共产党的支持者，然而他却不是共产党员。戈尔巴乔夫家族中没有任何别的人是党员。

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打乱了苏联很大一部分地区的生活模式。戈尔巴乔夫10岁那年，希特勒的军队入侵苏联。但是，斯塔夫罗波尔的人却感到自己远离前线，用不着十分担心。40年之后，斯

斯塔夫罗波尔的年龄较大的居民还记得，至少在一开始，人们并没有惊慌失措。他们觉得德国人不可能打到斯塔夫罗波尔来。他们回忆说，当时倒是在一夜之间出现了一股爱国热，使得人们对 30 年代社会创伤的记忆淡漠了。戈尔巴乔夫的哥哥和父亲应征入伍，被派到了前线。他哥哥在 1943 年的库尔斯克会战中牺牲了，而他父亲却一直打到了波兰，在那里负了伤。后来他回到普里沃尔诺耶村，一直活到 1976 年去世。

但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却发生了。到戈尔巴乔夫 11 岁时，向高加索和里海油井推进的纳粹军队占领了他们那个地区。

纳粹对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占领仅持续了八个月，看来在戈尔巴乔夫的脑海中没有留下深刻印象。原因可能是德国人把军队集中在大城市和交通线上，对农村的控制多少有点松。不过，德军的占领还是中断了他的学业，他上大学时年纪比许多别的新生要大一些。

几年之后，当戈尔巴乔夫看到德国人在俄国的其他地方造成的破坏是何等巨大时，他受到的触动要深刻得多。在这方面，他在对那场战争只有模糊记忆的一代人中是有代表性的。1950 年秋天，他在从斯塔夫罗波尔到莫斯科去念大学时——他后来回忆说——他“经过了被摧毁的斯大林格勒，经过了被摧毁的沃罗涅日。罗斯托夫被摧毁了。卡尔科夫被摧毁了。到处是一片废墟，整个国家是一片废墟。”相比之下，斯塔夫罗波尔逃脱了较大的破坏。

在战后初期的重建年代，由于男劳力严重不足，就在播种和收获期间让小孩子走出教室，帮妇女和老人干活。根据官方发表的戈尔巴乔夫传记，战争刚一结束，14 岁的他就给一位康拜因手当助手了。四年后，他被授予“劳动红旗勋章”，这标志着他已成为社会知名人物。这项殊荣为他打开了一扇极重要的门——翌年，他被推

荐到莫斯科大学去学习。这件事是官方发表的戈尔巴乔夫各种传记文本的起始点，就好像是说，还在少年时，他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至于他的平平常常的先辈以及他在斯塔夫罗波尔偏远乡村度过的少年时代，那就都略过不提了。

只是在他的运气和他的权威开始衰落的时候，他的斯塔夫罗波尔同辈人才开始披露有关这个走过了从普里沃尔诺耶村的两间泥房到克里姆林宫圣乔治大厅这一漫长历程的外省少年的宝贵材料。他们讲起他小时候常常顶着骄阳在尘土飞扬的玉米地里干活，然后坐在装着混浊的叶戈尔雷克河水的水桶里洗澡。他年轻时的这些朋友和熟人自然都是讲他的最好的事情。他们讲他多么有毅力——虽然每天要步行 10 英里到附近的赤卫队村的第一中学去上学，但他每门功课都是“优”，只有德语是“良”。他们强调他的好奇心，正如他的化学老师叶卡塔丽娜·恰伊卡所说，他“对任何东西都感兴趣”。他们还谈到他的“某种风度”。有些人暗示，他们早就知道他是注定要干大事的。然而，最有价值的情况是他的中学女友（一位教师的女儿）提供的。她现在是当地一个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她同戴维·雷姆尼克谈话时提出了一个条件，即他只能用她结婚前的名字：卡拉戈季娜。她回忆说，她那时很爱慕戈尔巴乔夫，因为他“有吸引力”。她说，在他那样大的少年中，他可算是个无所畏惧的人。“我记得他在历史课上纠正过老师的错误。有一次，他对一位老师感到如此气愤，竟说：‘你还想不想保住教师证书啦？’他是那种认为自己正确并且能向任何人证明这一点的人，不管是在校长办公室，还是在共青团会议上。”

或许是他的高中时参加的戏剧俱乐部使他做好了登上世界舞台的准备。“事实是，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卡拉戈季娜说，她虽比他高一班，但却常与他同台演戏。他演的角色中有一些是他在现

实生活中注定要担任的那种非凡角色——莱蒙托夫的《假面舞会》中的兹韦兹季奇大公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雪女》中的沙皇。有一阵子他甚至谈及要“争取进戏剧学院”，但他很少同她讨论未来，只说“我们一起到莫斯科去念书”。

卡拉戈季娜披露了戈尔巴乔夫公开同官员们打交道时不时会显露出来的另一个侧面。她说，他可能表现得很冷漠、很不随和。她回忆说，有一次，她曾因没有按时完成一期校报的出版而受到他的公开奚落。“他不顾我们之间的友谊，竟当着大家的面训斥我”，只是会后只剩他俩在一起的时候，他才建议两人一起去看电影。“亲爱的，这是两回事。”她记得他当时是这样说的。数年之后，即在他们各奔东西，戈尔巴乔夫当上了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第一书记之后，她曾写信给他请求帮她在城里弄一套房子。“我很快收到了回音。他在信中只是简单地写道，这不属于他的管辖范围……我应当向市当局申请，而不是向他申请。就是这样，如此一本正经，连一个温情的词都没有。”

戈尔巴乔夫在19岁时拍下的很少几张照片中，有一张是在离家去莫斯科的前夕拍的。他的头上很潇洒地戴着一顶哥萨克皮帽，但脸上却挂着一副有志青年的表情。他对许多事情都抱有好奇心，以致他拿不定主意攻读什么学科。“我总是对不同领域内的许多事情表现出兴趣，”他后来回忆说，“我说不清在学校时哪门功课特别令我感兴趣。例如，在大学里我读的是法律系，但起初我是想报物理系的。我非常喜欢数学，但我也喜欢历史和文学。”

他选择学习法律是不大寻常的。在苏联，法律既不是投身政治的阶梯，也不象在西方那样是谋求升迁的青年人的首要选择。或许青年时代的戈尔巴乔夫是想学当过律师的列宁的样子；或许他对法律问题的兴趣——正如我们曾听一位苏联高级官员所推测的

——是从他祖父的痛若遭遇中来的。

斯塔夫罗波尔使米哈伊尔受到一些他永远不会忘记的教训，正是这些教训使他对自已产生了一种近乎盲目的信任。他体会到，只要一个人本身拥有应变能力，那就任何艰难困苦都能忍受。一旦打定主意，他就会顽固到过分的程度。他还体会到，家庭的亲情是生活中最宝贵的财富之一。

莫斯科大学展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他所了解的一切的天地。

戈尔巴乔夫后来说，在莫斯科求学的时代是他思索自己的“道德准则、生活、幸福和正义的含义以及人类未来”的时期。不过，斯大林统治下的莫斯科并不是进行这种思索的恰当地方，所以他所指的大概是青少年通常进行的那种哲学探讨。在斯大林这个独裁者生前，戈尔巴乔夫肯定从未流露过对斯大林主义怀有任何厌恶情绪。他对政治的兴趣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兴趣导致他加入了共青团，并成为一名共青团积极分子，1951年成为苏共预备党员。

自从他选择了政治这一行以来，他公开表达的观点只反映出一位政界人士觉得应当说的东西，而不反映他个人的基本看法。否则他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生存下来的。至少他一定是颂扬了斯大林和他的政策，有力地批驳过“资产阶级自由化”、“世界主义”以及其他他想象中的国家的敌人。当时正是对斯大林的盲目崇拜达到极点的时候。

参加共青团是获得政治权力的唯一道路；只有积极的共青团员才有资格申请加入共产党。戈尔巴乔夫一到莫斯科就积极投入了共青团工作。他当上了班里的团小组长。这项职务的任务包括宣传克里姆林宫当时的政策，监视班上同学的政治情绪并向上汇报。在斯大林时代，团小组长们在履行其职责时常常干些不体面的事；然而，与戈尔巴乔夫同时就读法学院的那些苏联流亡者虽然记

得戈尔巴乔夫行使职务时表现得异乎寻常地认真,甚至有些咋咋唬唬,但却举不出一个例子说明他干过坏事。

只有1978年从苏联移居出来、比戈尔巴乔夫早一年毕业的弗里德里希·涅兹南斯基给他提出了一条罪状。他说戈尔巴乔夫是用一种不光彩的办法当上团小组长的——说他在选小组长的前一天晚上把他的主要竞争对手灌醉,然后又在第二天的会上批评他的举止。但是别的人都不记得有这事,而且看来这也不合乎他的性格。

1952年,戈尔巴乔夫当上了法学院的团委书记,这使他的政治生涯向前推进了一步。与此同时,他被转为苏共正式党员。苏联流亡者记得他当时曾是克里姆林宫路线的热情宣传者,这些记忆无疑是准确的。想必他是真心接受了斯大林晚年的反知识分子及病态的反犹太人思想的。当这位独裁者在去世前几个月“发觉”克里姆林宫医生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恰巧都是犹太人)的所谓图谋毒害苏联领导人的计划时,反“犹太复国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宣传运动达到了可怕的程度。只是由于斯大林在1953年3月去世,他的大批逮捕犹太公民并把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东端的“比罗比詹犹太人自治区”的计划才未能实施。然而,在斯大林去世前的那动荡不安的几个月中,许多苏联犹太知识分子受到公开谴责,并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岗位。莫斯科大学也不例外。该校的共青团小组长们在组织反犹太人集会和向与会者发表演说方面发挥过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些就是在米哈伊尔生活的这个转折点上应当考虑的事情。他为人正派,这同他的那些完全是斯大林主义宣传的言论形成了对照。批评他的人后来认为,这表明了他的政治野心和对权力的贪恋,因为一个从外省来的雄心勃勃的年轻人绝对不会想到斯大林